

于鬯
《春秋》
四传《校书》
训诂研究

熊
焰
著

于鬯《春秋》四传《校书》训诂研究

熊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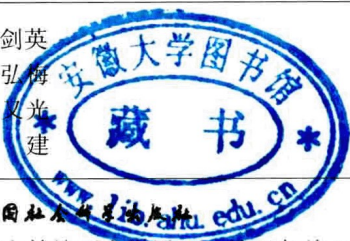
于鬯《春秋》四传《校书》训诂研究 / 熊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5161 - 3343 - 9

I. ①于… II. ①熊… III. ①校勘学 - 研究②《校书》 - 训诂
IV. ①G2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71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何义光
责任印制 李建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11 千字
定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出版受暨南大学广东省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
建设经费资助

序 一

李建国

大约七年前的一天，熊焰由广州来电说，她思之再三，决定报考王彦坤教授的训诂专业博士生，在职读研，想听听我的意见。这是我意料中的事：因为种种缘由，时下高校对从业者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早前毕业已从教有年的非博士人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若无博士的头衔，也越来越难以求职就业、安身立命；再说自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后，知识、理念、方法的更新日益迅捷，如不及时“充电”跟进，也很难适应教学科研的持续性发展；至于王彦坤教授，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他为人谦和，品行端方，学养深厚，尤长于训诂校勘之学，入其门墙，步武其学，无论做人为学，都是再好不过的事。因此，我极赞成熊焰的决定，鼓励她在行将步入中年的关口，不妨再做一次人生的拼搏。此后，她便一头扎进外语的复习和专业的准备之中。不久，就传来她考博成功的喜讯；接着又获知她将研究清末学者于鬯的训诂，论文的题目就是《于鬯〈春秋〉四传〈校书〉训诂研究》。

汉语训诂学是中华本土的学术，源远流长。自周秦肇其端绪，两汉成其规模，隋唐完其体式，至清代乾嘉时期，传注训诂、辞书训诂、考据训诂等齐头并进，著述如林，超迈前代而达于极盛。此后时移世异，西学东来，风气渐变，中国传统学术式微。爰及 1905 年，清政府废科举、弃经试，诏书令下，延绵两

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学及其训诂突然翻盘，永远失去了曾经的辉煌。生逢其时的于鬯（1854—1910），笃孝事亲，终生不仕，抱残守缺，专事于经史小学的教学和研究，遍读周秦汉魏诸古书，刊正脱讹，稽核同异，撰成著作三十余种，以代表作《香草校书》六十卷名世。于氏是继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后与俞樾、孙诒让同时的晚清训诂名家。缪荃孙《于香草墓志铭》称其“卓然成大家，真豪杰之士”，誉其著作“与俞氏（樾）《评议》、孙氏（诒让）《札迻》，卓然为三大师，非他人小小补苴能共语矣”。只是近代以来，神州板荡，政权更迭，学风嬗变，经学训诂命悬一线，于氏其人其学，遂被湮埋于时代大潮之中默然无闻。近三十余年来，大陆社会转型，经济突飞猛进，国力骤然大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复兴，清末民初之学术研究渐成热门。就中有关俞、孙二氏的研究，措意者多多，成就斐然，但对于氏、特别是对于氏训诂的研究，基本无人问津。在这种情况下，熊焰选择以于氏为论主，从不为人知处入手，可谓独具慧眼，占尽先机；复撷取《香草校书》中所校《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国语》凡十四卷405条，合称“《春秋》四传”，从训诂角度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可谓取精用宏，操作便当，易收窥斑知豹之效。

此后三年，熊焰一边从事日常繁重的教学工作，一边埋头研读于鬯《春秋》四传《校书》。她全面详细地考察了于氏四传《校书》的主要内容，分析归纳出于氏训诂的方法及其运用上的得失，逐一验证了于氏四传《校书》训诂成果在其后辞书编纂和古籍整理中的利用，着重论证了于氏训诂的六大特色，即：一、读书精审，察幽入微，常能发人之所未发；二、重视前贤时说，是是非非，当仁不让于师；三、较多关注考明史实与解释词的所指义；四、熟悉名物典章制度，重视其于训诂中之作用；五、同条之中，往往正误同存，瑕瑜并见；六、好立新说，往往求之过深，反为穿凿。这些论证言之凿凿，实事求是，在充分肯

定于氏训诂成就的同时，客观公允地指出其缺失，并深入探究了造成失误的原因：“于氏训诂有时会在没吃透原文、未正确审理文意的情况下，对旧注妄加指责，轻下断语。旧说本来可通，于氏却要标新立异，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变得不可理喻。而我们究于氏错误之源，往往在于或脱离了原文，背离了语境；或忽视了语言的时代性，缺乏历史的观点，失之武断和想当然。”凡此种种，都是对于氏四传《校书》的405条训诂札记经过“辨其是，析其非，寻其因，明其理”，在条分缕析、穷尽式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结论，它的科学性、可信性自不待言，抑或可以断言的是，本书的成果，不但为进一步全面研究于鬯的学术成就提供借鉴，而且对汉语史的建构乃至《春秋》四传的多学科研究亦将多所裨益。

时下商潮涌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风气浸淫，高校和学界惜未免俗。学者多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能求其放心、甘坐冷板凳、潜心真学问的读书种子日见其鲜。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熊焰置身于南方开放之都，独能摒除浮华，拒绝诱惑，笃志问学，好古敏求，其研究成果皆为守正自得之学，与那些沽名钓誉或声闻过实者不可同日而语。相信她经过博士课业的历练后，自今而往，教学科研工作必将有长足的进步。

熊焰的论文通过博士学位答辩后，几经修改，越二年方成定稿。今文稿即将付梓，索序于我。我既乐观其成，更钦佩其为人，为学，故不揣冒昧，写了上面的话。是为序。

2013年4月8日于京都居易斋

序 二

王彦坤

上章摄提之岁，熊焰君以《于鬯〈春秋〉四传〈校书〉训诂研究》一文轻取博士学位。同年，该文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后期资助项目年度立项。越三年，来而告曰：“文行付梓矣，望赐序。”诚可喜可贺事也！

于鬯堪称晚清训诂校勘之学名家，所撰《香草校书》《香草续校书》凡一百二十余万言，校诂所涉，遍赅群经诸子，兼及史部名著。缪荃孙称于氏其人“卓然成大家，真豪杰之士”，誉其书“与俞氏（樾）《评议》、孙氏（诒让）《札迻》，卓然为三大师，非他人小小补苴能共语矣”。虽小有拔高，却非全无根据。然于氏逝后百年之间，竟绝少有问津者，遑论作系统之研究矣。熊焰君此书，实为于氏《香草校书》深度研究之第一部著作，意义固不言而喻。

熊焰君此书研究虽仅限于氏《春秋》四传《校书》，然讨论问题包括训诂内容、训诂方法、训诂特色、训诂成果及其利用等诸多方面，考察细致，分析入微，按语平实，时见精论。而尤难能可贵之处则在，研究于氏而不拔高于氏，实事求是分析，客观公正评价，将于氏训诂之方法、特点真正呈现于读者面前，此不但为训诂学史研究对于氏其书其人之正确定位提供了切实可靠的参考依据，即当代治训诂者、作古籍整理者，亦可从中受启发、得借鉴焉。此正是书之有功于世者也。

熊焰君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又值学识、经验俱佳之际，若更乘其余勇，致力于氏《春秋》四传以外之《校书》研究，未来于学专家之称，当可期也。愿勉旃！

是为序。

2013年6月1日于暨南园无名室

目 录

绪论	(1)
一、于鬯与《香草校书》介绍	(1)
二、《春秋》四传与于氏校	(3)
三、研究现状及选题意义	(6)
第一章 于鬯《春秋》四传《校书》训诂内容考察	(8)
第一节 于鬯《春秋》四传《校书》训诂之主要内容 ...	(8)
一、解释字词	(8)
二、分析句读	(19)
三、探讨语法	(22)
四、说明修辞	(25)
五、发凡起例	(31)
六、考订典制	(36)
七、补明史实	(42)
八、校勘文本	(46)
第二节 于鬯《春秋》四传《校书》训诂所用之术语 ...	(52)
一、揭示虚词的术语	(53)
二、校勘文本的术语	(55)
三、标明句读的术语	(60)
四、说明字音的术语	(62)
五、标识声训的术语	(63)

六、表明意向的术语	(65)
第二章 于鬯《春秋》四传《校书》训诂方法分析	(70)
第一节 利用对文，推求词义	(70)
第二节 根据异文，比照诂义	(74)
第三节 联系字音，因声求义	(82)
第四节 扣紧原文，语境求义	(90)
第五节 遍检典籍，集例见义	(100)
第六节 多种方法综合运用	(104)
第三章 于鬯《春秋》四传《校书》训诂特色概述	(109)
第一节 读书精审，察幽入微，常能发人之所未发 ..	(110)
第二节 重视前贤时说，是是非非，当仁不让于师 ..	(115)
第三节 较多关注考明史实与解释词的所指义	(123)
一、训诂关注点重在考明史实	(124)
二、释词重视解释词的所指义	(129)
第四节 熟悉名物典章制度，重视其于训诂中之作用 ..	(133)
第五节 同条之中，往往正误同存，瑕瑜并见	(137)
第六节 好立新说，往往求之过深，反为穿凿	(147)
第四章 于鬯《春秋》四传《校书》训诂成果利用	
浅说	(158)
第一节 于鬯《春秋》四传《校书》训诂成果在	
辞书编纂中的利用	(159)
一、已为辞书采用之成果	(159)
二、可补辞书不足之成果	(162)
第二节 于鬯《春秋》四传《校书》训诂成果在	
古籍整理中的利用	(168)
一、于鬯《春秋》四传《校书》训诂成果对旧注	
之补正	(168)

二、于鬯《春秋》四传《校书》训诂成果在后世 之利用	(177)
余论 中华书局本《香草校书》中《春秋》四传 《校书》句读及字词指误	(192)
一、中华书局本《香草校书》中《春秋》四传 《校书》句读指误	(192)
二、中华书局本《香草校书》中《春秋》四传 《校书》字词指误	(223)
结语	(229)
主要参考文献	(232)
附录 于鬯著述一览表	(239)
跋	(241)

绪 论

一、于鬯与《香草校书》介绍

于鬯（1854—1910），字醴尊，又字东厢，自号香草，清代末年江苏南汇（今上海市）人。

于鬯耿直诚信。于氏为独子，光绪二十三年（1897）考拔贡时双亲年事已高，按当时朝廷典制，“亲老、单丁”者不得外出为官。曾有有功之出仕者劝其“伪撰一胞弟名”以“出而簪仕”，这于当时乃司空见惯之举，但于鬯断然拒绝：“我实无弟，而饰为有弟，是欺君也。君可欺，人谁不可欺？有何面目出而临民上乎？”终不肯为欺世谋名之事。

于鬯笃孝事亲。光绪二十三年拔贡，可得直隶州州判；此后又举经济特科，均因生母年高而绝仕不赴。生母卒，于鬯为母治丧，葬礼参酌古今，而去其乡曲不经之说。后因母丧而哀毁致病，绵延数年，终至不起。宣统二年（1910）七月十二日卒，年仅五十有七。

于鬯资质聪敏。成童即入邑庠学习，读书常有奇悟。一意治经，依从汉故，径入孔庭。崇扬朴学，卫郑伸许。生性高澹脱俗。著书之暇，则习为绘事，尤工墨菊。所绘雅菊，高澹绝尘，实可为自生之写照。

于氏曾师事张文虎和钟文蒸，王先谦则是其补廪膳生时座师。张文虎誉于氏家族“家学渊源”，称于鬯作为于氏家族后继

者为“英年笃学，潜心注疏，后来之秀当首屈一指”^①。王先谦亦“奇其文拔冠多士”，对于氏十分器重。于鬯与俞樾等同时代的清代训诂名家亦有交往。俞樾曾致书于氏，称之为“余畏友也”，盛赞于氏之“好学深思，读书每有心得”。对于氏孜孜穷经更是倍加称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空谷之中，跫然足音。可敬可喜也。”

于鬯一生致力于教学和经史小学研究，曾主持南汇“芸香草堂”讲席，提倡汉学，使“士习丕变”。光绪二十三年（1897）于周浦创立“治经会”，专力于“郑鄠之学”。“自段氏《说文》外，凡桂、严、朱、王各家言，莫不博览而精研之。复以形声训诂辗转通借之例，遍读周秦汉魏诸古书，刊正脱讹，稽核同异”^②，撰成著作三十余种（手稿本今存南京，其女婿张以诚所抄校副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其中刊印行世的有：《香草校书》六十卷、《香草续校书》二十二卷、《战国策注》三十三卷（另《序录》一卷、《年表》一卷）、《周易读异》三卷、《尚书读异》六卷、《仪礼读异》二卷、《香文钞》、《说文职墨》、《花烛闲谈》、《读周礼日记》、《读仪礼日记》、《卦气直日考》等。可谓著作等身，成绩斐然，当为继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后与俞樾、孙诒让同时的晚清训诂名家。清代缪荃孙《于香草墓志铭》称于鬯“卓然成大家，真豪杰之士”，誉其《香草校书》等著作“与俞氏（樾）《评议》、孙氏（诒让）《札迻》，卓然为三大师，非他人小小补苴能共语矣”。

于鬯代表作品《香草校书》六十卷，收录于上海图书馆所藏《于香草遗著丛辑》，另有据光绪二十九年（1903）刊印本刊行的中华书局1984年单行本行世。《香草校书》主要校勘的是

①（清）张文虎：《怀旧杂记》卷一，金陵冶城宾馆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第6页。

②《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江苏省·南汇县续志二》卷十三《人物志一》，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

经书，除“十三经”以外，还附有《周书》、《大戴礼记》、《国语》和《说文》，凡十七种，共计84万余字。俞樾对于氏《香草校书》评价甚高，认为于氏所论“多剖析入微”，所析“证据分明，莫能易其说”。张寿林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于鬯《香草校书》所校《春秋左传》六卷有过评价：“错综当时势事，考订字句非赀。凡事实有所未安，或词旨有所未畅者，则分别校正之。故名之曰校书。其考订事实，校勘文字，皆时多创见。”“统核全书，终不失为瑕不掩瑜之作焉”。张氏之评价虽仅针对《春秋左传》六卷，实可施于于氏整部《校书》。《香草校书》，不但校勘文字音读，而且校明词义误释；不但校正句读失当，而且校订史实虚谬。林林总总，实广义之训诂存焉。

二、《春秋》四传与于氏校

《春秋》是现存最早的我国历史上鲁国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乃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所载历史，上起自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下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历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代君主，共计242年。《春秋》以年、月、日来记载史实，名之《春秋》，当如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云“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其内容主要记载了春秋时期242年中鲁国、周王室以及其他诸侯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大事，亦记载了一些自然现象。

传统认为《春秋》是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孟子》、《史记》、《汉书》等文献中皆有孔子作《春秋》之记载：《孟子·滕文公》：“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记·孔子世家》亦称：“（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

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据学者的研究结论，孔子作《春秋》的说法并不足信。杨伯峻《经书浅谈·春秋》、清人石韞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对此均有详论。“《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①足见《春秋》实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是集体经多年编纂而成。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当因于孔子曾用《鲁春秋》传道授业，孔门弟子将之传述流传下来的缘由。

《春秋》略于记事，意义隐晦。全书一万六千余字，记事一千八百多条，往往一条仅记数字，叫人难以理解，于是为之诠释讲解者应运而生。《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左氏、公羊、穀梁、夹氏、邹氏五家，“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故现存流传下来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亦称为《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于《春秋》类文献之首，所著录为三十卷。书中所载史实较《春秋》多二十七年，讫及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记载：“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故旧说以为《左传》乃左丘明所著，“两汉魏晋学者均无异辞，至唐赵匡始疑非左丘明所作，宋元以来疑难者争论不休”^②，近人则以为是战国初期学者据各国史料编成，迄今仍无定论。《左传》解经，以记事为主，兼记言论，史料价值极高。

《公羊传》也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相传为战

① 参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② 倪金荣：《〈春秋〉及其“三传”》，《历史教学》1993年第5期，第52页。

国时齐国人公羊高所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一卷。《公羊传》专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它以义理说经，不详史实，故史料价值不高，但对理解《春秋》字义，了解先秦名物和礼仪却有参考作用。

《穀梁传》也称《春秋穀梁传》或《穀梁春秋》，相传出于战国时鲁人穀梁赤（或作穀梁俶，或作穀梁喜）。《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一卷。《穀梁传》不释微言，多解大义，叙事简略，也是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按国别记事的史书，所载史料，上起于西周穆王二年（前990），下至东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记叙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个国家前后五百三十八年的历史事件。因是书以“国”分目，以记“语”为主，着重记述“邦国成败，嘉言善语”，故名之为《国语》。

历来以为《左传》、《国语》互为表里。《汉书·律历志下》引《国语·楚语下》“少昊之衰”及《周语下》“颛顼之所建”等语都称“《春秋外传》曰”，故后人多把《左传》称为《春秋内传》，《国语》称为《春秋外传》。三国时吴·韦昭《国语解序》：“（《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汉·王充《论衡·案书》：“《国语》，《左氏》之外传也。”

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见太史公是把左丘明看作《国语》作者的。唐·刘知几《史通》亦谓“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逸史，纂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周穆王，终鲁悼公，为《春秋外传》——《国语》”。后人对此亦多异见，而朱熹、郑樵等于宋代时便已有质疑。聚讼之说，终无定论。现在一般论定《国语》为战国初期人汇编春秋时代史官所记史料而成。

我们把《春秋三传》之《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及《春秋外传》之《国语》合称为“《春秋》四